

新全球发展与治理^{〔*〕}

——以南南合作为视角

肖 瑾, 李小云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100193)

〔摘要〕南南合作缘起于冷战反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先后出现了万隆会议、七十七国集团、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南南合作的阵地,但是由于国际发展合作话语一直受西方主导,南南合作在其后的 30 多年中进展缓慢,从最初的强调经济政治诉求转变为以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为主要内容。直到以中国为首的南方国家崛起,南南合作有了新的发展契机,开始进入新南南合作阶段。新的全球发展和治理正是伴随新南南合作的兴起而到来。南南合作在贸易、投资和国际发展合作多个领域都对全球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全球发展与治理提供了新的方案。

〔关键词〕新南南合作;全球发展;全球治理;中国;全球南方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9.01.017

一、引言

二战以后,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去殖民化运动使得许多殖民地国家纷纷走向民族独立的道路。这是继历史上传统的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新一轮新兴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去殖民化运动既是西方在进步力量驱动下的结果,也是殖民地地区人民斗争的结果。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殖民地新形成的所谓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继承了殖民时代的政治经济遗产,一方面与原

殖民者之间却产生了结构性的裂痕。殖民后的发展中国家与原殖民者之间的矛盾成为了去殖民化初期除了冷战之外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的最新特点之一。南方国家概念的出现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

南南合作经历了从政治性团结到南方国家之间发展经验的分享以及现在包括新资本、物质、新发展经验分享和南南合作制度化形成成为特点的新南南合作的不同阶段。长期以来,除了中国和印度为南方伙伴提供各种形式的物质资金

作者简介:肖瑾(1990—),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国际发展;李小云(1961—),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一带一路农业合作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发展学。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发展援助与中国发展援助的战略政策比较分析”(项目编号:16AZD017)的阶段性成果。

支持以外,南南合作一直局限于政治性的团结和发展经验的分享等软性方面的交流。从20世纪末开始,南方国家迅速崛起,在南方国家中形成了新兴国家,新兴国家和其他南方国家一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全球的社会经济结构,南南合作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首先,南方国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与50、60年代的经验完全不同。这些独立的发展经验在南方国家形成了平行性的经验分享,与南北垂直差异的发展经验形成鲜明对比。其次,南方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具备了很强的经济实力,南方国家之间的经验分享已经不再仅限于会议讨论层面,而是更多地转向物质资金的流动。第三,南方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发展制度的重要性,因此发起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由此可见南南合作已经进入到了新南南合作的阶段,新的全球发展和治理正是伴随新南南合作的兴起而到来。

二、南方国家的政治团结——万隆会议

学界普遍把万隆会议当作南南合作的起点,这是因为万隆会议是第一次没有殖民者参加的会议,并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联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独立和国家发展的诉求。二战结束后去殖民化运动首先在亚洲展开,以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为标志,亚洲的去殖民成就直接影响了非洲的去殖民化运动和反种族歧视运动。^[1]1945年泛非大会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参会的200多名代表主要来自非洲,他们要求非洲民族独立解放,并要求殖民者无条件结束殖民统治。其后召开的万隆会议顺应了亚洲和非洲民族国家摆脱殖民主义的独立自主的需求。在万隆会议召开之前非洲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时称阿比西尼亚)、利比里亚、利比亚和南非^[2]等5国取得独立,亚洲有15个国家获得独立。

万隆会议最重要的成果是提出了独立自主和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这一个特点体现在会议成果《亚非会议最后公报》^[3](以下简称

《公报》)提出的十项原则中。不干涉内政指的是“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4]不干涉内政在政治理念上表现为中立主义,由于南方国家独立时期处在冷战阶段,只有不在意识形态对立的美苏阵营的任何一方站队才能保证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独立。正如参加首次亚洲关系会议的一位缅甸代表所言:“被西方大国统治可怕,被亚洲大国统治会更加可怕”。^[5]因此中立原则和不干涉内政也成为南南合作的基本原则,一直贯穿南南合作的整个发展阶段。万隆会议除了强调南方国家的团结以外,同时强调“遵循联合国宪章”,一方面这是取得联合国支持获得新兴国家的合法性策略,另一方面也奠定了南南合作与联合国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这是联合国一直推动南南合作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南方国家一直利用联合国这个平台,来推动满足自身诉求的原因,联合国的“南方化”从这里开始。^[6]

万隆会议的第二项重要成果是强调国家间的发展合作,通过进步国家与新兴独立国家间的援助合作,实现经济独立。《公报》提出了在经济、文化、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合作目标。这些合作目标都围绕着巩固南方国家经济政治独立的目标展开,虽然南方国家积极提出倡议,但是因为二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和主导,所以这一时期的南南合作还是依靠当时既存的国际合作秩序。二战结束后,国际机构开始出现,联合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的前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总部都设在纽约或华盛顿。其中联合国的建立目标是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建立是希望向各国政府提供贷款,使世界贫困国家和人民受惠。这两个机构的大部分资金都由美国提供。《公报》的经济合作部分建议设立联合国经济发展特别基金会,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拨出更大一部分的资金给亚非国家。^[7]万隆会议在其成果中将现有国际

机构的角色写入其中,反映了南南合作在最初阶段由于各国财力和政治、经济力量的缺乏无法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抗衡的现实。美国作为新的超级大国,不同于旧时代殖民体系中以英国为首的传统殖民帝国,美国的立场也一度支持去殖民化运动。所以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南方国家寻求与新崛起的超级大国美国一致的援助合作的策略。《公报》还建议设立国际金融公司,包括进行股权投资,鼓励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联合企业。^[8]这也与现在由联合国主导的所展开的一系列国际合作方式一致,为将来国际合作开辟了金融和投资领域合作的道路。此外,《公报》的经济合作中强调国家间技术援助的作用,倡导南方国家间互相提供技术援助,通过提供专家、示范试验工程装备、交换技术知识实现国际合作。^[9]这也与联合国经济社会委员会1949年成立的第一个联合国技术援助项目一致,也成为日后南南合作中技术交换的前身。

万隆会议增强了亚非国家的民族主义,极大地激励了还在争取民族独立、摆脱殖民统治的亚非人民,特别是对万隆会议之前只有5个独立国家的非洲而言,万隆会议之后非洲各国摆脱殖民统治的斗争如火如荼展开。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末非洲约有130个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其中有80多个是在万隆会议结束后的5年里建立的。^[10]1960年17个非洲国家先后宣告独立(见表1),因而在世界历史上被称为“非洲年”。

表1 1956—1960年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

时间	国家
1956	苏丹
1956	摩洛哥
1956	突尼斯
1957	加纳
1958	几内亚
1960	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马里、象牙海岸、上沃尔特、汤加、达荷美、尼日尔、尼日利亚、乍得、喀麦隆、中非、加蓬、刚果布、刚果金、索马里、马达加斯加

由上可知,南南合作的兴起将去殖民化运动推向了高潮。万隆会议开创的“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内政”等共识成为南南合作框架的基石。国家之间发展合作在会议公报中被反复强调,预示了国家主导的发展官僚体系将成为南方国家发展和南南合作的主要方法,也是南南合作视角下全球发展与治理的标志。

三、国际经济新秩序与东亚发展型国家的崛起

拉美国家由于取得独立的时间长,积累了近100年的发展经验,独立后拉美国家主要依赖北美和欧洲市场对初级产品的需求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一直到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欧洲和北美的需求急剧萎缩,拉美国家的经济受到重大打击,但由于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探讨拉美道路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进口替代的方案,拉美经济在经历经济危机后以进口替代的模式得以继续增长。从1945到1975年的30年里,拉美国家钢产量增加了20倍,电力、金属、机械增长了10倍。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和智利被划入世界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列。^[11]这一阶段的南南合作呈现出拉美国家推动南方国家七十七国集团成立、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另一方面,1960年以来,随着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作为七十七国集团创始成员国韩国成为东亚模式的代表,政府主导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开始为全球发展提供另一种方案。

(一) 国际经济新秩序

1964年第一届贸发会议上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表《七十七国联合宣言》,成立七十七国集团。《七十七国联合宣言》标志着南南合作从南方国家的政治团结走向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化的诉求。1974年5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宣言》强调每个国家主权平等,对本国的资源和经济活动拥有一切完整的主权;强调每个国家都有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受到任何歧

视,并对本国的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活动拥有充分的自主权;发展中国家出口原料、初级产品、制成品与进口原料、初级产品、制成品之间建立公平的价格关系等。^[12]与此同时,《宣言》继承了1955年万隆会议不干涉国家内政的原则,并且进一步将这项原则放在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中要求,如《宣言》中指出“整个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积极援助,而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或军事条件。”^[13]此外,比起1955年万隆会议的《公报》中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平等的诉求,《宣言》也更加直接明确:“在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一切领域中,只要办得到,行得通,就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特惠的和不要互惠的待遇。”《宣言》还指出,“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以便把财政资金转移到发展中国家。”^[14]

早在拉美经济委员会成立之时普雷维什就提出了国家干预的工业化的战略,认为国家干预可以弥补市场的不足解决发展中国家边缘化结构的问题。^[15]到1964年第一届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以下简称贸发会议)召开和七十七国集团成立时,支持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已经写入会议成果文件。第一届贸发会议的几个提议围绕如何促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经济诉求召开:一是要解决初级产品的问题。由于来自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周期传播导致初级产品出口国在经济周期下行期间出现需求量和价格大幅下跌的双重损失,需要探索成立一个国际商品协议,使用国际金融缓冲库存作为解决的方法。另一方面,初级产品出口国的初级产品出口收入相对于制造业出口收入增长缓慢,建议加速初级产品出口国的工业化,取消工业化国家对初级产品进口壁垒、关税升级、劳动密集制造业进口的限制。二是要推动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出口关税优惠,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需要从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变为出口导向工业化才能推进。三是要发展补偿性金融以弥补发展中国家贸易不平衡的损失。

(二)东亚模式与发展型国家

1960年代以来,日本、新加坡、韩国先后实

现工业化。发展型国家开始成为解释东亚模式的核心概念。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最早是学者约翰逊针对日本在二战后实现工业化所提出的概念。^[16]约翰逊在讨论日本经济奇迹时指出,日本的国际贸易与工业部为发展型国家提供了一个最好的起点。在资本短缺的年代,日本以国家作为缺失资本市场的代理人来刺激投资。日本本国的邮政储蓄系统和国家发展银行对获取工业投入的资本至关重要。国家作为提供资本的中心角色促使其落实了“工业理性化”和“工业结构政策”。日本的国际贸易与工业部成为监督整个过程的“试点经纪”,具备为国家开发银行批准投资贷款、授权进口外国技术的外汇分配许可证、提供减税、提供规范产业的行政指导等能力,这使得国际贸易与工业部成为最大化激励决策的角色。日本发展型国家的成功还表现在其与韦伯式官僚假设的契合。官员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需要通过与其官僚体系制度规章的协调一致而不是通过暗中的个人机会主义来达成。此外,日本的发展型国家还强调非正式网络在官僚体系中发挥的积极作用。约翰逊发现通过gakubatsu与精英大学的同学建立联系是官僚体系精英招聘的一种方式,例如东京法学院的校友聚集的平台——非正式网络batsu。这种非正式网络增强了官僚体系内部的连贯性。^[17]对外,非正式网络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部委的校友网络与市场上的企业联系,例如通过部委重要职位退休的人员所形成的强大的非正式网络——Amakudari的嵌入机制。与日本类似,韩国的工业化取得成功也是因为发展型国家的推动。韩国政府人员的组成基于严格考试的精英选拔制度,有类似日本国际贸易与工业部的国家“试点经纪”作为发展代理人——经济计划委员会(EPB)。发展型国家具有韦伯式官僚体系的特点。发展型国家的官僚体系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组成,具备专业化的知识,他们获得良好的薪酬,与家长制国家和掠夺国家的臃肿低效率形成鲜明对比。

由上可知,这一阶段的南南合作在拉美国家的带领下取得了不小的突破;南南合作从万隆会议阶段的政治独立诉求拓展为经济贸易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南南合作的国家也从万隆会议时期的亚非国家合作拓宽到亚非拉国家的合作。另一方面,东亚发展型国家以国家主导的发展官僚体系也为南方国家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参照。

尽管成就有目共睹,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导致南方国家之间的内部分化拉大,南南合作仍处于曲折发展的阶段。首先是七十七国集团内部的分歧,1971年,普雷维什的继任者佩雷斯·格雷罗希望能够推动成立七十七国集团秘书处,但因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国内部分歧而不能成立。秘书处是设在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秘书长由哪个大洲选出?谁来负责经费?这些都是产生分歧的地方。大的发展中国家担心自己背负了经济责任,而秘书长却倾向于从小国选出。最终的结果还是维持七十七国集团依赖于联合国贸发会议来提供政策议程。其次,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逐渐拉大。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东亚发展型国家为标志的亚洲四小龙崛起,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同时也是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国之一。1982年韩国的人均GDP已经超过2000美元,1985年韩国人均GDP达到2542美元,而同为七十七国集团成员的越南人均GDP只有人均239美元,^[18]不及韩国的1/10。此外70年代石油危机使得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发展中国家凭借石油价格上涨经济实力大增,进一步与其他七十七国集团国家拉开差距。第三,南方国家之间的分化还与整个国际发展局势相关。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导致初级产品出口国中最穷的发展中国家被迫向新自由主义转型。^[19]发展中国家开始采纳世界银行主导的结构调整方案。虽然贸发会议和七十七国集团直面南北贸易不平等的问题,提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然而在现实中遭到发达国家的反对和阻挠,前文关于初

级产品出口、补偿性金融等议题中第二个关税优惠方面取得突破,1968年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二届贸发会议上,关税优惠(GSP)获得了发达国家的让步,其他几条都因为发达国家的反对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再加上美国主导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影响,贸发会议的经济诉求的职能日渐式微。于是其逐渐由多边贸易与发展论坛转变成提供技术援助、政策研究和数据信息的平台。^[20]

四、减贫成为全球发展议程

1978年南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会议上通过了《促进和实施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21](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强调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在最不发达国家如土地缺乏和小岛国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南南合作开始由60年代的以政治经济诉求为主转向南方国家之间的技术合作与减贫。

《行动计划》体现了万隆会议以来自力更生与尊重国家主权的南南合作精神。例如《行动计划》提出“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根据自己的理念、价值观和特殊需要,找出解决其他发展问题的方法,来实现发展中国家的自立。通过交流经验,收集共享和利用技术资源以及开发自己的各种辅助能力等来促进和加强发展中国家整体的自力更生能力。”^[22]

至此,南方国家间的技术合作开始成为南南合作的主流,也成为联合国官方定义的南南合作的基础。200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专门单元正式改名为“南南合作专门单元”,标志着南南合作知识生产平台正式建立。联合国对南南合作的定义是:南方发展中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领域合作的一个广泛的框架。涉及两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可以以双边的、区域的、次区域的或跨区域的合作为基础。发展中国家通过共享知识、技能、专家和资源以实现其发展目标。南南合作办公室还鼓励三方合作,即传统援助国家与其他多

边组织通过提供资金、培训和管理技术等形式以支持南南合作的倡议被称为三方合作。^[23]

另一方面,进入 90 年代,由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在发展中国家遭遇失败,导致许多南方国家背负重债,经合组织将发展议题从经济增长转向减贫领域。1999 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出《减贫战略文件》作为重债穷国获得减债的前提和基础条件。减贫战略开始作为国际援助机构主导的各发展中国的战略。《减贫战略文件》遵循的核心原则有:(1)基于广泛的国家和所有权;(2)基于参与式制定过程,实施和基于结果监测;(3)注重结果,使穷人受益;(4)全面的范围,承认多维度贫穷原因的性质,以及多维度减贫的措施;(5)以伙伴为导向,为其提供基础,积极协调地参与发展,合作伙伴(双边,多边,非政府)支持国家减贫战略;(6)基于中长期视角减少贫困,认识到持续减贫无法在一夜之间实现。^[24]

《减贫战略文件》所制定的原则看上去十分合理:既注重南方国家的国家所有权,又注重公民社会组织和各种援助机构的广泛参与,也注意到了贫困问题的多元性与长期性。然而,结果却与设计背道而驰,《减贫战略文件》并没有取得实质的成果。外界对减贫战略的批评不绝于耳,有的学者直接指出《减贫战略文件》是失败的,不但没有帮助穷国减贫,反而使这些国家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对外开放市场,加剧了人民的贫困。有的学者认为《减贫战略文件》并没有遵循参与式的原则,公民社会组织对于决策过程没有产生影响,决策仍然由援助机构官僚体系主导。^[25]还有学者指出,《减贫战略文件》是西方国家侵蚀非洲国家主权的新手段。减贫战略的实施体现了多边机构作为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政治代理服务器的职能,西方援助机构掌握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详细情况,参与制定《减贫战略文件》,并最终审核这些文件是否合格,加强监管和调控,参与减贫战略的非洲国家将成为国际金融机构管理下的“公司”。在这种条件下,非洲主权国家的传

统权力被分享,以国际金融机构为代表的西方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私人企业等利益集团将共同分享非洲国家政府维持秩序、调节经济和协调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职能。另一方面,这些利益集团对这些国家减贫战略的实施要加以控制,各多边机构和援助方所强调的《减贫战略文件》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国家所有权”,其实是“多边援助方主导下的所有权”。^[26]

2000 年联合国大会制定千年发展目标。八项目中第一项就是消灭贫困和饥饿。在第八项促进全球合作中,更是强调致力于善政、发展和减贫,满足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需要:对其出口免征关税、不实行配额;加强重债穷国的减债方案,注销官方双边债务;向致力于减贫的国家提供更为慷慨的官方发展援助;满足内陆国和小岛屿发展中国的特殊需要,与私营部门合作,提供新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产生的好处等。^[27]结合上文,不难发现,千年发展目标与西方援助国家提出的《减贫战略文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与连贯性,南方国家发展议程也由此纳入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发展议程中。

五、新南南合作的兴起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使得经合组织(OECD)国家经济持续低迷,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的经济则继续增长。金砖银行、亚投行相继成立,南南合作作为一种新的国际合作范式受到传统援助国家的关注,经合组织开始承认南南合作的地位,并在 2008 年专门成立了南南合作任务组,国际合作正从北方—南方国家的“援助者—受援者”的关系转变为不同层级行动者之间资源和知识共享的关系。^[28]

这一阶段南南合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南方国家发展经验的共享。南方国家发展经验的共享与南方国家的崛起之路密不可分,二战以来,尽管经历了种种曲折,南方国家中仍然有几个发展中大国脱颖而出,成为南方国家经验共享的典范。其中尤其以中国的崛起最令人瞩目,新

中国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只用了短短半个世纪就从农耕国家转化为制造业强国,贫困人口从1990年的6.89亿下降到2011年的2.5亿,是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使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29]中国的减贫经验开始成为全球发展中国家学习的典范。

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承诺: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到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将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并将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同各国一道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30]2018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为非洲国家提供600亿美元的支持。2015年12月25日,全球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在亚投行的57个创始成员国中,包括20多个发展中国家,也有老挝、越南等贫困国家和传统发达国家。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占四席,二十国集团国家占14席,七国集团国家占4席,金砖国家全部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使沿线70多个国家从中受益(其中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2016年9月二十国集团峰会在中国杭州举办,本届峰会是历史上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会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中方邀请了东盟主席国老挝、非盟主席国乍得、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主席国塞内加尔、七十七国集团主席国泰国,以及哈萨克斯坦、埃及两个有代表性的发展中大国出席杭州峰会。会议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成功地引入”二十国集团峰会议程,使峰会第一次围绕落实该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这是二十国集团历史上首次在峰会上同时讨论与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是中国引导二十国集团峰会“全面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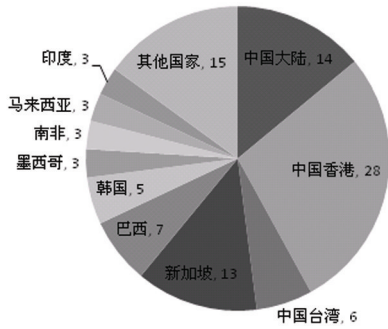
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具体体现。这一议题的成功引入,标志着中国成功地将二十国集团从讨论短期全球金融危机管理转变为从长远角度讨论世界发展问题。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标志着以“中国方案”为代表的南方国家的发展主张正在逐渐成为构建新全球发展与治理的重要力量。

新南南合作还体现在南方国家为全球提供了新的发展资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统计,近十多年来,南方国家在全球贸易的比重快速增加。其中南方国家的进口额比重从2000年的28%增加到2014年的43%。出口额从2000年全球总出口额的22%增加到2014年的38%。发达国家的相应比重则分别从2000年的72%、78%下降到2014年的57%、62%。^[31]南方国家之间的进出口贸易基本与南北方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逐渐接近。

除了贸易额的增加,南方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也在增加。2015年全球投资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主要是亚洲国家,中国和新加坡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最多,投资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来源总额的55%,巴西以7%排在之后。发展中国家(中国、巴西、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南非)总共占发展中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的33%(见下页图1)。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中,亚洲(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占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的58%,欧洲占13%,非洲占4%,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占4%,北美占7%(见下页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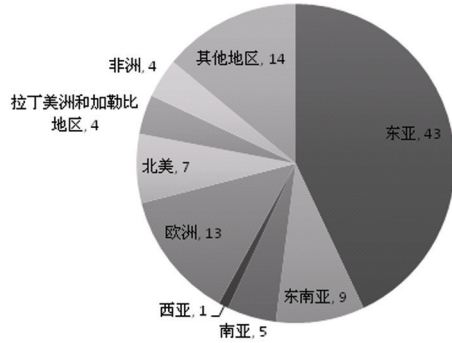
在国际发展援助方面,南方国家也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南方新援助国家的国际发展援助金额在逐年增加。其中,中国已经是南方国家中最大的援助提供国,中国的官方发展援助支出远超过金砖国家的印度、巴西和南非;印度居于中国之后成为金砖国家中第二大援助支出的国家(见下页表2)。

图1 主要发展中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来源百分比
(单位:%)



(来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5)

图2 发展中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地百分比
(单位:%)



(来源: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5)

表2 金砖国家发展合作优惠流动(类官方发展援助)金额估算^[32] (单位:百万美元)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中国	911.9	1033.27	1466.86	1807.57	1947.65	2010.61
印度	414.5	381.4	392.6	609.5	488	639.1
巴西	158.1	277.2	291.9	336.8	362.2	923 ^[33]
南非	42	49.1	85.2	89.2	119.5	98.4

(数据来源:World Bank, IPEA)

六、结 论

综上所述,经历了万隆会议时期南方国家之间的政治性团结到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和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使得一些南方国家经济腾飞,到结构调整和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下联合国贸发会议职能逐渐转变为技术咨询机构,再到减贫成为全球发展议程,南南合作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的崛起为南方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与援助提供了新的资源和新的发展经验,新南南合作正在成为新全球发展与治理的标志。

尽管南南合作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前景,但依然面临许多挑战。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新兴国家进口需求呈现下降趋势。^[34]虽然消费品和服务贸易表现出恢复状态,但是预测全球贸易继续走低趋势、全球投资减弱、供应链整合与贸易自

由化减速。这些都对南方国家间的合作带来了挑战。

南方国家间的内部分化也是南南合作的一大挑战。由于各自地缘政治、自然禀赋差异明显,一直以来都有发展中大国和发展中小国、岛国等区分。例如,第二次亚非会议和七十七国集团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尝试也因为南方国家内部的分化遭受挫折。有学者提出南方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是否意味着一种新的不平等关系和依附关系的产生,如何避免出现新的霸权需要南方国家坚持南南合作最初的原则,共同促进南方国家之间发展经验的知识共享平台的完善,以及践行平等互利的宗旨。

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发展知识建立在前殖民时代、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欧洲与非欧洲联系上。殖民体制解体后,“欠发达”国家的概念取代了早期的、带有轻蔑语气的概念,同时“发达”

国家的责任转变为帮助其他国家达到“发达”的状态。由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还是认识论上的,因为发展的知识被发达国家所主导。^[35] 亚投行等多边机构能否超越“发达”与“欠发达”的殖民时期遗留的二元对立的认识论,能否提供新的发展知识,需要将从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中得到的理论层面的经验教训,转化为系统的知识,建立新的全球发展与治理的知识体系。

注释:

[1][英]理查德·雷德:《现代非洲史》(第二版),王毅、王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6—267页。

[2]南非虽然独立,但独立后一直实行白人政治和种族歧视政策,所以不少学者认为1910年的南非联邦政府为“白人殖民者勾结的产物”,或称为“英属南非”,认为到1961年南非共和国成立以前南非都不是独立国家。

[3][4][7][8][9]参见《亚非会议最后公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91828.shtml。

[5]William Henderson,“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ism in Sou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9, No. 4 (Nov., 1955), pp.463—470.

[6]Armen Aghazarian, *We the Peoples of Asia and Africa: The Bandung Conference and the Southernis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1955—1970*, https://ses.library.usyd.edu.au/bits-tstream/2123/8623/1/Aghazarian_a_History%20Thesis%20S1_2012.pdf.

[10]陆庭恩:《论万隆会议及其影响》,《西亚非洲》2005年第3期。

[11][美]R.R.帕尔默等:《现代世界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496页。

[12][13][14]《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http://www.un.org/zh/documents/treaty/files/A-RES-3201(S-VI).html。

[15]Evolution of ECLAC Ideas, <http://www.cepal.org/en/historia-de-la-cepal>.

[16]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7]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18]世界银行数据库。

[19]K Gray, B Gill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7, No. 4, 2016, pp.557—574.

[20]Massoud Karshenas, “Powers, Ideology and Global Development: On the Origins, Evolution and Achievements of UNTAD”, *Development and Change*, 2016, pp.664—685.

[21][22]United Nations, Buenos Aires Plan of Action (1978), <https://www.unsouthsouth.org/bapa40/documents/buenos-aires-plan-of-action/>.

[23]参见 <https://www.unsouthsouth.org/about/about-sstc/>。

[24]Jeni Klugman, *A Sourcebook for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ies*, The World Bank, 2002.

[25]Jim Levinsohn, *The World Bank’s Poverty Reduction Strategy Paper Approach: Good Marketing or Good Policy?* <https://g24.org/wp-content/uploads/2014/03/21.pdf>.

[26]杨宝荣:《西方减贫战略对非洲国家的政治影响》,《西亚非洲》2003年第5期。

[27]参见《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http://www.un.org/zh/millenniumgoals/>。

[28]参见 <http://www.oecd.org/dac/effectiveness/taskteamon-south-southco-operation.htm>。

[29]参见《中国贫困人口减半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6-21/3979520.shtml>。

[30]参见《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的讲话(全文)》,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27/c_1116687809.htm。

[3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DOTS 数据库, <http://data.imf.org/?sk=9D6028D4-F14A-464C-A2F2-59B2CD424B85>。

[32]缺少俄罗斯的数据。

[33]2010年巴西的数据据 IPEA 统计约为 9.23 亿美元,参见 IPEA: *Brazilian Cooperation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0*, <http://www.ipea.gov.br>。

[34]World Bank,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Divergence and Risks*, <http://pubdocs.worldbank.org/en/842861463605615468/Global-Economic-Prospects-June-2016-Divergences-and-risks.pdf>.

[35]Griffith—Jones, S., Li XiaoYun, Spratt, S.,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What Can It Learn From, and Perhaps Teach To, the 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IDS), Brighton, UK(2016)37pp, [IDS Evidence Report 179], <https://www.gov.uk/dfid-research-outputs/the-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what-can-it-learn-from-and-perhaps-teach-to-the-multilateral-development-banks>.

(责任编辑:马立钊)